

论我国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演变

——基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制度变迁的分析

廖天虎

内容提要: 民间金融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由于民间金融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 所以能有效缓解不同类型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民间金融具有天然的风险特征, 致使国家对其监管采取了严格审慎的政策。文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对民间金融监管的相关制度变迁进行分析, 提出我国民间金融当前应赋予的制度环境, 以便更好地认识和规范民间金融, 使民间金融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环境中充分发挥其融资功能的作用。

关键词: 民间金融 监管制度 变迁 评析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17) 01-0111-08

一、引言

目前,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方兴未艾的民间金融, 由于其自身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将能有效缓解不同类型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在我国, 民间金融有着悠久的历史, 曾繁荣一时。从夏商时期, 到秦朝统一货币, 然后到盛唐时期, 伴随着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 以民间信贷为主要形式的民间金融日渐昌盛。民间金融是一种以经营行为的非正规性、隐蔽性为特征的金融行为, 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的发展如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正常需求, 就有可能产生民间金融。民间金融的产生有其历史形成和社会发展的多重背景, 并因其独特的补充正式金融的作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 得以长时期的存在并不断发展。尤其自 2011 年以来, 由于受全球不利经济形势的冲击和我国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 我国部分地区的企业资金链断裂, 致使生产经营出现困难。一些因民间借贷不能及时归还的企业出现了企业债务人的“跑路潮”, 这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民间金融负面效果的体现, 不仅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 损害了金融市场的信心, 而且加剧了风险向银行体系蔓延的危险。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民间金融监管的相关制度变迁进行分析, 提出我国民间金融应有的生存环境, 以更好地认识和规范民间金融, 使其在“大众创

作者简介: 廖天虎,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我国地下金融风险的法律控制”(项目编号: 14SX7108)。

新、万众创业”环境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及其表现形式

民间金融在我国历久不衰,自然有其存在的内生原因和外部条件。我国当前的民间金融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一直存有争议,由于评价的标准不同,得出的最终结论自然也有所不同^①。

(一) 我国民间金融的现状

近年来,媒体频频爆出我国区域性的民间金融事件,规模之大、涉案金额之多令人咋舌。例如,作为中国“能源双子星”之一的陕西省榆林市因其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实现了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夜之间催生出众多亿万富豪,房价随之暴涨了10多倍。然而在这个所谓“遍地黄金”的城市,民间金融竟然占整个金融业的八成(王力凝、黄杰,2012)。根据金融学的理论,货币供应量是经济金融活动结果的货币表现,从货币供应总量中减掉经济增长所吸收的货币量,所得的剩余量则为非经济增长因素所吸收的货币供应量。从理论上讲,民间金融活动所吸收的货币资金就包含在这个剩余量中。由于民间金融主要是短期资金融通,有学者以一年内的贷款增量为基础,计算出2003年当时全国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8164亿元之间(李建军,2005)。由于我国有着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划分,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在财富的分配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共同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两极收入差20余倍,城乡之间的财富聚集的悬殊差异导致民间金融在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有所不同。

1. 城镇地区的民间金融概况

由于城镇地区居民手中的“闲钱”相对较多,而银行存款利率偏低,投资股市又有很大的风险,因此这些城镇居民更愿意通过熟人、朋友或同学等关系将钱投入地下钱庄或是采取其他能够获取高额利息的融资方式。对于位于城镇地区的中小企业来说,解决企业资金难的问题,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把这些“闲钱”汇集起来,供自己所用。由于目前城镇地区的信贷需求旺盛,担保公司最为常见。担保公司经营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贷款置换,二是垫资注册,三是变相吸存,四是变相放贷,由此可见,城镇地区的有些担保公司实际上从事的是民间金融业务活动。在城镇地区,除这类从事民间金融业务的担保公司外,还有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但这样的公司除自有的一部分资金外,其放贷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正规金融机构,一旦出现资金断裂,引起的风险最终将传导至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由于民间借贷利率较高,少数民间融资实质是来自于银行体系,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从银行体系流出的资金再流向企业,这些担保公司或典当行等扮演了“资金掮客”的角色,这样的情形实质上违反了我国刑法规定的不得高利转贷的

^①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民间金融课题研究小组于2003年采用大范围的抽样统计调查与现代经济计量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推测当年的地下货币资金规模为8200亿~9200亿元之间,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2003年我国的GDP为116694亿元)的7%左右。

规定。

2. 农村地区的民间金融概况

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差距,农村在金融需求量上要小于城镇。在我国的金融部门商业化改革的过程中,金融部门看重的是城镇金融领域,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必然会退出无利可图的农村信用领域。有学者在2004年对分布在我国东、中、西部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41个村落进行了民间借贷的调查,调查到借贷案例57起,放贷案例27起。对调查资料作统计处理后发现:除了有两个地方存在不计利息的民间借贷外,其余地区均有高利息民间借贷存在。如果按照调查地点计算,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85%(温铁军,2004)。现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借贷行为开始发生变化,并呈现如下特点:(1)农民借贷活动逐渐频繁,并由生存性消费借贷向发展性生产借贷转化。(2)生产性借贷属市场风险投资,由于农业资金更加贫乏,急需资金的借贷者只能接受高利率的市场风险。(3)建房、婚丧嫁娶和生死病老等福利性借贷仅次于生产性借贷(史清华、陈凯,2002)。从借贷关系上看,农村的民间借贷也可分为直接借贷和间接借贷两种,间接借贷主要是通过银行获取资金,而直接借贷主要是通过银行以外方式的获取资金^①。但目前农村的借贷以直接借贷方式为主。

(二)我国民间金融的表现形式

民间金融的模式日新月异,风险形式和违法犯罪样态愈来愈复杂,民间金融案件可谓“案案有不同,件件有花招”,通过民间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解析其特性,可以更好地认识和规范民间金融。有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地下借贷、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金融服务社、证券业地下融资市场、金融担保合作社、地下彩票和地下保险等(蒋寒迪、张孝锋,2007)。从不断暴露的民间金融风险案例来看,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体系主要涉及民间借贷、地下钱庄、典当行以及P2P形式的网络贷款平台等,尤其是一些披着合法外衣的民间金融组织,其形式日趋组织化、隐蔽化、系统化和科技化,甚至有与金融机构合流的态势。根据对浙江省义乌市和东阳市地区的调查发现,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招牌在这些地方遍地皆是,虽然各自招牌的名字不同,但基本上都会涉及民间金融,且不同的招牌对应着民间金融体系中的不同层次,例如寄售行开办手续简单,只要求工商登记即可,投入成本很小且按照规定不得融资,如果仅做正规生意则盈利有限,于是大多从事寄售行业务的人员都会偷放高利贷,他们私下以3分利、5分利从亲友处集资,再以5分以上的利息放出去。再例如,小额贷款公司本是监管部门意图引导民间金融阳光化之举,但在这些地区小额贷款公司实际上也在参与一些非正规的金融活动(胡润峰,2011)。

^① 直接借贷的形式主要有:1. 自由借贷,这类借贷正逐渐向高息方向发展,范围也不再限于亲戚或熟人之间。2. 邀会,也叫摇会、轮会、合会、标会。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都存在,其正式名称为轮流储贷会。3. 民间商业信用,在商业活动中以赊销、预付货款等方式来推销或购买产品。4. 银背,属间接借贷活动,银背即借贷活动的中介人,为借贷双方搭桥牵线,收取手续费或信息费。5. 民间集资,指农户、个体经营户、乡镇企业及乡村政府组织筹集资金的活动。6. 典当行,贷款要求以不动产进行抵押,融资速度快、手续方便。

金融方式可区分为直接金融方式和间接金融方式^①,相应的,我国民间金融按照表现形式也可以分为间接金融方式和直接金融方式:间接金融方式即是以合会等民间借贷和变相吸收存款的形式,通过储蓄主体将资金存入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周转载体,由金融机构以借贷等形式来间接实现储蓄到投资的转化的金融方式;直接金融方式则是指个人、企业或单位未经批准通过非法募集股份、发行债券或私募基金等方式来进行融资,具体表现为个人借贷、地下钱庄、企业非法集资和私募基金等(李建军 2005)。由于我国存在着银行的国有垄断和利率的严格管制,致使当前的中小企业很难通过银行等间接融资的管道获得资金。对于我国的中小企业而言,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不仅标准要求严格而且融资成本高昂。基于此,广泛存在的中小企业就会选择包括民间借贷等民间金融的原始的直接融资方式,但在大量民间金融兴起而缺乏完备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极易发生扰乱金融秩序和破坏社会稳定的民间金融风险事件。

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间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

金融监管的制度逻辑在于风险的控制。民间金融在我国历史悠久,且形式多样,然而由于其对经济生活的“实用性”,导致民间金融经久不衰,民间金融的风险也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得以显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民间金融风险及其危害性,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思路,并运用了相应的法律手段予以规制。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演进经历了四个阶段(胡滨 2012)^②,在这四个不同阶段和时期的金融政策的变化,体现了我国民间金融监管政策的演变过程,也反映出国家对民间金融态度的变化。

(一) 初始阶段(1949~1978年):嵌入计划经济中的“大一统”管理

此阶段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为单一主体的金融集中管理体制,集货币政策、金融经营和管理职能于一身。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于1951年5月召开^③,这次会议明确了农村信用社在组织性质、功能定位以及业务范围方面的一系列原则,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金融制度并不能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因此一些民间高利贷等民间金融仍然存在。20世纪

^① 直接金融方式(直接融资)由于是储户和投资者直接面对面的借贷,省略了中间环节,它可以节约中间环节中的交易费用,但其不利的地方在于:第一,由于储户直接面对投资者,投资失败的风险也直接由储户来承担,这样投资人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当然其追求的风险溢价也就会更高;第二,现代直接融资的成本与其规模成反比,如果资金需求规模较小,则直接融资的成本就会很高。间接金融方式(间接融资)的优点在于:由于资金所有人和资金需求者之间不直接接触,资金所有人就避免了直接承担投资的风险,其追求的风险溢价自然就低些,加上金融中介机构的信息优势地位,可以通过选择性借贷来降低其风险,因此,间接融资的风险溢价就会低些。在一个完备的自由竞争的金融市场下,对于大企业而言,因为其融资规模比较大,其信息优势更为明显,在直接融资中所需支付的风险溢价和融资成本会相对较小,则大企业一般会选择直接融资;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其融资规模较小,而且企业信息基本上属于私人信息,它们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成本相对较高,所以它们可能会选择间接融资。

^② 以下关于我国金融监管几个阶段的划分的时间节点引用了胡滨主编的《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2)》一书的观点,具体参见胡滨《中国金融监管发展道路:1949~2011》。

^③ 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于1951年5月10日在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上指出“信用合作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的合作组织,主要是组织农民自己的资金,调剂有无,以解决社员生产上和生活中的资金困难,银行给以资金周转及业务上的支持,并可代理银行的一些委托业务,以活泼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生产。”

60年代初,我国把高利贷活动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放高利贷者已经演化为一个“新的剥削阶层——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定位之后,从1963年开始,有关部门逐步综合运用了经济、行政和政治运动等手段对农村高利贷进行了打击(杨乙丹、高德步,2008)。这种置农村经济状态于不顾的单方面打击高利贷等民间金融活动的行为,不仅不能根除高利贷等民间金融活动产生的土壤,反而加剧了高利贷等民间金融活动的风险溢价。至此,我国有关“高利贷”等民间金融活动的治理被开始标上“政治”色彩,坚持的是“严控和严打”的思路。

(二) 过渡阶段(1979~1991年):初步建立以银行监管为主的金融监管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促使我国金融体制作出了相应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被正式确立为中央银行,成为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同时国家相继恢复或新设了几大专业银行和保险、信托及证券等行业的金融机构。但此时的金融监管的地位和权力仍依托行政体系,并不是由法律明确授权和规定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和城市开放,鼓励和支持农村个体经营的发展,提出支持农村信贷事业,并于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1983年下半年,农村基金会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开始产生和发展,深受农村群众的欢迎,也得到了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1986年1月7日,为了加强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管理,保证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①,其中明确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1987年,中央决定开始进行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试验于1992年进入普及发展和配套改革阶段,意在解决农村的金融难的问题。在此时期的城市地区,尤其是我国的沿海一带,由于市场化进程推进得更快,出现了分散型的作坊式生产的企业,但这些企业没有体制内明确的社会地位,因而很难获得国家正规金融服务体系的支持,致使民间金融在我国的沿海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自1988年起,我国经济过热,物价开始上涨,全国掀起了“抢购风”,导致各个行业的资金面紧张,抬高了民间借贷的利率,致使“抬会”等各种类型的民间金融组织又开始流行起来。

(三) 发展阶段(1992~2003年):实行“一行三会”金融分业监管体制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金融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先后设立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专业监管机构,分业监管体制得以确立。立法部门还先后颁布了银行法和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使我国的金融监管进入法治化阶段,并确立了基本的金融法律体系。

1992年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推进,由于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法律缺失与法律滞后,使得在1993年和1994年发生了长城机电公司非法集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已于2001年10月6日颁布并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所废止,但该条例中的相关规范已被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5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代替。

案、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之后,对案件中的相关主要责任人都是以1979年制定的《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来定罪量刑。1995年被称为我国金融立法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5月通过的《商业银行法》首次提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1996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当年我国的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而分开经营。1997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清理整顿、切实规范管理的报告》,国家开始对过去几年脱离有效监管而泛滥发展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清理。为防范金融风险,国务院于1997年11月决定全面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1998年各地普遍出现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挤兑热潮,危及到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基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和深刻教训,国务院于1998年7月颁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①,并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进行了定义,该规定将民间金融视为“非法”。根据国务院的上述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又先后颁布了《整顿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在这些严厉的金融政策打压下,此后的民间金融活动彻底转入“地下”状态。1999年,由于农村基金会在运行过程中造成的金融混乱进一步显现,给各地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国务院于当年1月发布3号文件决定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全面清理整顿,由此全国开始了大范围取缔和清理农村基金会的行动。2003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该阶段的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变迁,清晰地反映出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金融体系带有非常明显的“严格管制”色彩。

(四) 完善阶段(2004年至今):发展和完善分业监管体制

在应对金融全球化机遇和金融危机挑战的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加强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其他改革的探索,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丰富监管内容,加强监管执法。经济快速发展和为防止流动性泛滥实施的银根紧缩政策,使得经济发展与货币流动性之间的矛盾得以凸显,利率控制和银根紧缩导致民间金融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在此阶段,国家在完善相关的民间金融法律体系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和惩处民间金融案件的力度,陆续出现了大量有关民间金融风险的典型的大案和要案。以江苏省为例,2006年、2007年、2008年三年间,江苏省公安经侦部门对集资诈骗案件立案分别为26起、37起、91起,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立案51起、53起、99起,两个罪种的立案数平均每年分别递增194%和145%。在上述案件中,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39名、78名、136名,打击处理人员数平均每年递增187%(孙开锋,2010)。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民间金融的活跃程度,另一方面也表现司法机关对民间金融犯罪严厉惩治的态度。尤

^①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台,由于受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十分活跃,严重干扰了国家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极易引发社会风险,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出台此项“办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整顿金融秩序,限制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降低金融风险。

其值得关注的金融政策变化是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于2013年11月22日正式通过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这是我国首部地方性金融法规,为民间融资管理提供了法制保障,但由于这只是一部地方性法规,为民间融资松绑和为民间金融提供发展环境还需要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提供更大的空间。

四、对我国民间金融监管政策的评析

上述四个不同的阶段显现了我国金融监管理念的嬗变(胡滨 2012): 1. 集体主义,即金融监管要为国家阶段性目标服务。2. 稳定优先,即由于金融问题往往会引起社会动荡,在金融领域中的效率和安全的权衡中,政府自然是把安全放在首位,这也成为我国金融监管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的首要价值目标。3. 市场需要管理,在我国经济体制下,“市场需要管理”是一种公认的经济哲学理念,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既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责任,不同于西方国家贯彻的自由经济主义。4. 发展中完善,即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理念,我国金融领域的监管也不断通过探索和试错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发展中完善”的理念正指导着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5. 全面覆盖,即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设计的监管目标是覆盖金融体系的所有领域,“全面覆盖”的理念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征决定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本位”主义的坚持,体现在管理制度和方式上,就是体现国家意志和管理职能。众所周知,我国金融业过去是、现在也主要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这种做法其实源自1929年至1933年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带来的深刻教训。接任胡佛总统临危受命的罗斯福总统大力推行其新政,放弃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学说,转而实施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然而对金融的过分管制和干预又影响到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这使得金融监管理念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①。运用经济学理论来概括和总结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可以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就是“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金融抑制”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dward Shaw)这两位学者分别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出的,该理论指的是一种货币体系被抑制的情形,这种抑制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受到割裂,对实现资本积聚的质量和数量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黄韬 2012)。该理论认为以金融管制代替市场机制,这样造成的负面后果极容易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在“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由于资金价格的单一性,必然导致正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市场的超额借贷资金的需求,民间金融的出现便成为满足市场需求的必然现象。

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经济发展的行动准则,为了保证经济政策的落实,国家要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包括利用惩治方式最为严厉的刑法来保证经济政策的实现。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和法律体系还不完善,这就导致自发而粗放的民间金融一直游

^① 由于我国金融监管理念的落后与错位、金融监管体制的结构失衡和监管治理机制的薄弱、监管方式的缺乏创新和监管规则的严重滞后,这不仅导致了我国金融监管的低效运行和金融机构竞争力的低下,而且使金融业风险隐患激增,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危害金融安全的瓶颈。

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边缘,脱离监管后的民间金融在严重违反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后,将会通过刑法予以规制。经济政策在打击经济犯罪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影响甚至决定着当时的刑事政策,左右着立法机关的犯罪化的决策,当然经济政策出现问题时,也会影响到刑法对经济犯罪规制的效果。基于经济政策和监管制度对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的影响,我国有关民间金融刑事政策的规制,将既涉及到刑事政策的制定,又关系到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

五、结 语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对于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只要不会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就应更多地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只要其行为没有超出法律的边界,无须国家的过多干预。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应当引入司法强制,加强国家干预,尤其应当从主体的适格性、双方经济关系的平等性和利率规定的合理性这几个维度加以规范和限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更加灵活的金融市场。民间金融具有内生性、补充性和一定正当性的特征,应当对民间金融有公正的认识和恰当的定位,有效处理好鼓励民间金融创新与加强规范民间金融之间的关系。随着互联网技术对金融业务的渗透,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金融业态,对此应当既予以支持鼓励,又要树立防范法律风险的意识,尤其是刑事法律风险,切实维护好金融的稳定性,防止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参考文献:

- 胡滨 2012 “中国金融监管发展道路:1949~2011”,载胡滨主编《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胡润峰 2011 “感受浙江民间金融风险”,《第一财经日报》2011-08-29。
- 黄韬 2012 《“金融抑制”与中国金融法治的逻辑》,北京:法律出版社。
- 蒋寒迪、张孝锋 2007 《中国民间金融市场中的利益群体及其博弈分析》,北京:华龄出版社。
- 李建军等 2005 《中国民间金融规模与宏观经济影响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 廖天虎 2011 “论我国农村高利贷的法律规制路径——兼及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完善”,《农村经济》2011 8。
- 史清华、陈凯 2002 “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山西 745 户农民家庭的借贷行为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2002 10。
- 孙开锋 2010 “非法集资犯罪调查”,《公安研究》2010 3。
- 杨乙丹、高德步 2008 “农村高利贷及其治理的历史审视:1957—1966 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 2。
- 王力凝、黄杰 2012 “民间金融占八成政府出手救市”,新浪财经网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428/034611948476.shtml>。
- 温铁军 2004 “我国农村为什么普遍发生高利贷?”,<http://business.sohu.com/2004/05/09/78/article220057842.shtml>。

(下转第 154 页)

(责任编辑:刘 英)